书人访谈

成尚荣:年轻的品格

本报记者　王珺

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著名教育专家成尚荣和孩子们一起席地而坐。当时他已年近八旬，他也自知，那一蹲一站于他是吃力的，但在儿童“沸腾的审美情绪”面前，他还是选择了跟儿童一样的姿势与他们对话。

“他，有着让人过目难忘的气质，高大的身材，轩昂的气宇，炯炯的目光，纹丝不乱的发型，还有冬日里的围巾。”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校长戚韵东这番描述可谓是成尚荣形象的“写真”。

“一席谈吐，能够点醒误入藕花深处的教育者，让听过的老师明白，教师是派到儿童世界去的文化使者，教育的过程是充满道德的，智慧是有道德的。一席谈吐，能够点亮着急赶路的名师的前行方向，让听过的名师知晓：失去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去真人。做一个精神灿烂的人，给每个儿童提供合适的教育，是名师应有的追求。”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则道出了成尚荣给予教师的精神启迪。

成尚荣自嘲地称自己是“迟飞的鸟”，“退休后才安下心来，真正地读一点儿书，写一点儿小文章”。近年，这位老教育人不断有新书问世：《成尚荣教育文丛》《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等。不久前，他的教育随笔集《年轻的品格：教师的精神气象》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成尚荣提出，教师的精神成长、教师精神世界的丰盈与深刻，比什么都重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从培养年轻的品格开始。

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两侧的傅厚岗曾住过几位大家：徐悲鸿、傅抱石、林散之……家住傅厚岗的成尚荣常在他们的故居前驻足。只见故屋，如见故人，在这些文化大家的故事里，他读到视野、胸怀、智慧，也读到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深厚品格。

成尚荣说，讲述故事需要一只内容丰富的工具箱。作为资深教育人，他的工具箱里有书籍、艺术、课程和教科书。他用自己教育岁月里的思考为我们讲述他所理解的“教师成长”，以及如何成为一名有精神气象的教育者。

儿童中间的成尚荣。　受访者供图

成尚荣，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

1 青春

读书周刊：您为自己的新书取名为《年轻的品格：教师的精神气象》，为什么强调‘年轻’？年轻的品格’与教师精神有怎样的联系？

成尚荣：关于教师的青春话题，是我这些年观察、思考、写作比较多的。年轻，不止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年轻本身意味着品格。年轻的品格具有成长性，因而具有终身性。青春是青年教师绕不开的、关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从李吉林老师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的青春年华和孩子在一起，在教书育人中，“长大的儿童”成了青春的另一种称号。当然，究竟何为‘年轻的品格’，有不少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读书周刊：人总是害怕衰老的，您有这样的恐惧吗？

成尚荣：我自然也怕老去，但还比较坦然。平日走在大街上，我常常不自觉地追赶年轻人的脚步，从步幅到步频。这样做，也许是想再做一回年轻人。不过，我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即使脚步跟不上，心一定要跟上，有青春的心态，才有青春的书写，也许这就是年轻的品格。

读书周刊：确实，您的文字有种青春的气象，而且富于诗意，自成风格，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成尚荣：有人曾开玩笑说，这是“成氏风格”。在我看来，风格是人的影子，其意是人的个性使然，其意还在风格任人去评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写作风格究竟是什么，只知道那些文字是从我的心里流淌出来的，大概真实、自然与诗意，就是我的风格。不管风格不风格，有一点我是认同的，那就是相信黑格尔对美的定义：美是用感性表达理念和理性。黑格尔的话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感悟’，以及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提及的‘直觉把握’相通。所以，我认为写作首先是打开感性之眼，运用自己的直觉把握。我自觉而又不自觉地坚持了这一点。每次写作，总觉得自己的心灵又敞开了一次，又自由呼吸了一次，似乎是沿着斜坡向上起飞。心灵的自由才是最佳的写作状态，也是最适宜的写作风格。

读书周刊：关于教育写作，您提出：不必把教育写作看得过于神圣，但心里一定要有‘神光’；不必把教育写作看得过于神秘，不妨从有感而发开始；不必把教育写作看得过于专业，不妨把视野放开；不必把理论看得过重，但一定要用感性去表达理性。您这‘四个不必论’挺有意思。

成尚荣：写作当然是崇高的、神圣的。但是，写作，包括教育写作，别过于强调崇高感、神圣感，而一定要倡导生活感，要有梦想。读师范时，我曾对要好的同学说：‘以后我一定要有篇文章登在《新华日报》上。’也许那是我教育写作梦的开启。有没有这样的梦很不一样，至今我还常常提起它，因为它已长在我的心里了。

师范毕业，等待分配工作的那段时间，我看了不少电影文学类的刊物，像着了魔似的。边看边想，我能不能也写个电影文学作品呢？如果能拍成电影更好。这也是一个梦，可至今都没有实现，不过梦已写在我的教育生涯里。我想，自己的教育人生不就是个美好的电影脚本吗？我们不正是在讲述自己如电影一样的教育故事吗？

读书周刊：您写作的灵感来自哪里？

成尚荣：当了小学教师，我曾写过《柿子下的故事》，写的是校园里两棵柿子树结满了红红的柿子，成熟了，分给全校的同学，一人一只。故事登在儿童刊物上。现在想来，教育写作恐怕不能离开校园，更不能离开儿童。教育写作的源泉是丰富的校园生活，儿童则是灵魂的天使。我们得主动邀请灵感，教育写作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安顿在校园里。

2 成长

读书周刊：在您最初走上讲台的时候，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成尚荣：我六七岁的时候从出生地吕四渔场来到了南通城里，在濠河旁的三所母校——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南通中学、南通师范学校度过了我的小学、初中、中师时光。我1962年中师毕业，一直到暑假结束，才接到通知让我去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任教。我感到自己被幸运之神眷顾了。走上讲台的第一年，学校就安排我教六年级毕业班。校长说，年轻没经验没关系，学校相信你。

读书周刊：您跟李吉林老师是同事？

成尚荣：是的。我参与了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的研究，1984年调往省教育厅工作后，仍参与研究，那是我的黄金时期。那六年的研究让我重新认识、发现了教育。我体会到，教育研究不在教育之外，而在教育本身。一个好教师，不仅要爱教育，还要研究教育，而教育研究，不能离开教学，也不能离开儿童。

读书周刊：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您有哪些体会和收获？

成尚荣：记得一次李老师对情境教育之‘情’有一些新的想法：情境教育只讲‘情’不讲‘理’吗？情’与‘理’相悖吗？情’与‘理’如何融合？她邀我去请教华东师大的杜殿坤教授，上海师大的吴立岗教授，南通师专的徐应佩、周涌泉等教授。多少次的拜访，多少次的讨论，多少次的梳理，已经记不清了。记得其中一次是一个晚上，在南通的南公园宾馆，杜教授作了讲解；一次是在无锡，我们向吴教授追问个性发展问题；一次是在校园里，徐应佩、周涌泉二位教授侃侃而谈……由此，以研究的方式做教师，做学者型教师，像一颗种子悄然播在我心中。

读书周刊：您的身份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生了转换，从小学教师到教育科研工作者，您对教育专业如何理解？如何看待专业身份与名师成长？

成尚荣：我对专业的理解，不囿于学科，也不囿于课程，而要在人的问题上，在文化问题上，在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大问题上进行深度的阐释和建构，这样的专业是大专业。由此，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我曾提出‘第一专业’的命题。对教师专业发展如此，对教育科研工作者也应有这样的理解与要求。

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情境中，教师有不同的专业身份及其解释，体现不同的意义。只有厘清教师专业身份的结构和内涵，才能较为完整、准确地把握教师专业身份的含义和价值，才能有效地推动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专业身份让名师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3 儿童

读书周刊：您的《儿童立场》一书去年作为中国教育报读书会的共读书目，吸引了全国众多教师共读。我注意到，在《年轻的品格：教师的精神气象》中，也设有专辑讨论“儿童的秩序”。“儿童”为什么成为您的重要研究课题？

成尚荣：我一直认为，儿童研究应该是教育研究的母题，教育的一切研究都要从儿童出发。在现实中，儿童也的确在我的教育生活中沸腾着。我喜欢美学之父鲍姆嘉登谈及“审美情绪”时用的“沸腾”这个词，我相信，在沸腾的审美生活中，儿童才是鲜活的。

读书周刊：智慧的教师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儿童观？

成尚荣：智慧有大小之分。庄子在《齐物论》里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教师应该是有大智慧的人。教师的大智慧在于对儿童的研究，来自对儿童的认识和发现。这是因为，儿童是教育的主语，教师的智慧与使命，就是保护并建构这块神圣的根据地，让它安全、健康、丰富、充实，逐步强大起来；教师在保护与建构这块根据地的同时也建构起自己的精神高地，生长起自己的智慧。

读书周刊：在《儿童立场》中，您写道：“小学教育好比一个谜语，这是人生之谜，解开谜就会拥有更美的人生。”这句话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修辞，更在于道出了教育的真谛。

成尚荣：作为“派到儿童世界去的文化使者”，我虽已年至耄耋，却总觉得有一颗童心在胸腔里活泼地跳跃，于是我有了一颗灵魂。这颗成熟了的童心和真正的灵魂是我在通师二附的校园里获得的。对我来说，那是我心灵的谷仓和深藏的水井，那也是我教育之旅的源泉。

读家观点

阅读时，『我』在哪里

张圣华

阅读时，“我”在哪里？读“书”，有书即可，何必有“我”？

事情可没有这么单纯。笔者一直强调“激活阅读主体”，强调“得鱼而忘筌”（详见拙作《培养活泼泼的阅读主体》），是针对整个阅读过程而言。具体到阅读一本书的时候，确有一个“我”在哪里的问题。

阅读时“我”在哪里，要从阅读规律中去找寻答案。

阅读的第一阶段应是忘我的状态，是书的信息被吞入的过程。即彻底打开自己，以忘我的静观状态全神倾注书中，读懂文本，弄清本意，触摸书的灵魂，感受其魅力，以达成与书的共鸣。此时，读者与作者其实有一种隐形合作——阅读时，读者与书的共鸣本质是读者与作者息息相通，不仅领会作者要表达的精神，还会补齐作品中的留白，甚至还会拓展出作者想不到的意境，这本身是又一度创作。此时，尽管状态是忘我的，但“我”是存在的，只是在“潜龙勿用”的状态。在阅读时，“我”的前期知识和经验储备在起作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根源在此。这也是读懂文本的基础。对于阅读经典来说，这只是阅读的初级阶段，尚属浅阅读。这一阶段要完成基本的信息纳入。

第二阶段是在前期阅读的基础上细嚼慢咽，其任务就是反刍咀嚼，属于深阅读。读者对书的前后内容进行联系、比对，作纵深分析，归纳总结，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玩味。此时，“我”必须深度介入。这个阶段被很多读者忽略，并没有展开，以为阅读已经结束了，何必再去费劲琢磨。这一阶段，“我”要对书里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对书里的诸多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神会作者用心之处，到达会意之境，同时也是打开眼界、自我开悟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时期，不识字的石勒却酷爱史书，就让人读给他听，这也是一种阅读：“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石勒听史书，并对其中的关键人物和事件作出分析判断，这对他判断时局、分析重大节点问题，是个很好的训练和参照——这其实是一种深度阅读的状态。作为一介文盲的羯族人，他能在中国北方一度成势，应与此有关。

按说，这一阶段便是阅读一本书的终结。而事实上，书的内容已经植入读者记忆，这种记忆，包括阅读体验，会不断在脑海中闪现，还会不时对接现实。“我”、书与现实的融合发酵，酿成一种独特的营养，被“我”吸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阅读还在以隐形的方式进行，这就是第三阶段：生成精微，化而为“我”，是对书的深度消化。

在这个过程中，阅读者逐渐摆脱对书的有形内容的依赖，却又吸纳了书的灵魂，有些信息或许忘却，精华部分却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神而忘其形。再加上“我”对书的个性化体验、理解，并结合现实的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我”的自觉改造过程。在不知不觉间，“我”已非读前之“我”，而是一个新的自我。这要求阅读主体（“我”）须有可容之胸怀，有强大消化和吸收能力，才能把书中精华拿来化“我”。练武者练到一定程度，会功夫上身，这就是个化我的过程，用的时候不须考虑，自然施展。真正读透一书，必有化我之功。

所谓“化我”，其实是阅读主体达到被书高度激活的境界。毛泽东博览群书，对书中事并不人云亦云，而是“我”说了算，对历史人物和大事都作出自己的判断，他反复批阅《二十四史》就是明证。拿破仑之所以成为拿破仑，也因所览群书皆为“我”用，“我”是书的主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读书读到佳处，读者的思维或情感被高强度激活。没有被激活是失败的阅读，或书不好，或人不对劲。然而历史和现实中博览群书者也有“不了了”者，对书的生吞活剥或被书覆盖，则会成为孔乙己这类人。阅读的过程是生成新问题、链接其他问题，并找寻答案的过程，也是修正自我、观照万物的过程。

这三个阶段也可视为三个层次，三种状态。高明的阅读者也可能同步进行，一举达成。

读好书如同与高人交谈，常有醍醐灌顶。“腹有诗书气自华”，书可化气；“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三毛语），读书可美容；读书可启智增知；书可育人，书可安心；读书可打开生命、拓宽心胸、开阔视野……读书之义博矣，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的沉淀都是人的变化——使“我”更加丰满，即阅读主体的系统性强大。

编著者说

心理学亦为“幸福学”

林茶居

2007年，大夏书系推出新的子系列‘教育讲演录’，其中两本书名为《做一个幸福的教师》和《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其他讲演录，虽然书名上没有“幸福”一词，但实际上也大都包含有‘何为幸福的教育’‘教师以何幸福’‘教师如何达成职业幸福’等意义旨趣，如张文质的《教育是慢的艺术》、刘铁芳的《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刘良华的《教师专业成长》、钱理群的《我的教师梦》、吴康宁的《转向教育的背后》、陈玉琨的《一流学校的建设》、李镇西的《用心灵赢得心灵》等。作为项目编辑，我也因为这套书，得以从不同路径探索‘教师与幸福’这一课题。

2012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大夏书系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在‘书展’举办地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大夏书系·十年经典》的新书发布会。顾名思义，这套书是从大夏书系创立十年来所出版的420多册图书中，基于专业影响、社会美誉、市场认同等因素，精选出来并加以修订的一套丛书，共计14本。其中，“教育讲演录”有3本，包括朱永新老师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那几天，朱老师的行程安排刚好就在上海，于是我们邀请他到发布会现场作主题演讲。

在去往会场的车上，我和朱老师谈定了一个事情：《教师月刊》（大夏书系创办的刊物）开设一个名为“朱永新答”的专栏，由编辑部征集或设计话题，请朱老师笔答，每月一篇。刚开始，话题比较多样，后来逐渐集中到‘阅读’上。

不过，我们没有拘囿于‘阅读’本身，而是从呼应教师精神成长的需求和专业结构的完善出发，拓开一步，再抬高一点，关注写作、出版、传播、知识产权等相关领域。比如，我们设计了这样的话题向朱老师请益：‘如果请您来给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老师们编写一本普及性质的心理学图书，从人类已有的心理学研究和实践成果当中，您会抽取哪些思想、理论、方法、工具？’朱老师通过笔谈予以认真回应，就这一本‘理想中的书’的结构和内容提出了大体设想。

现在回过头去看，设计这个话题，应该有着‘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一理念的暗示。从艺术的角度说，‘幸福’是一种情感状态；就科学的角度讲，‘幸福’呈现为一种心理图式。两者交织之下，心理学正是理解幸福、研究幸福，进而拥获幸福、分享幸福的重要支架。朱老师和他的团队提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一‘实验总纲’，除了来自对教育基本价值、核心规律的深刻把握，也一定有着充分的心理学考量。

朱老师本来就是做心理学研究出身的，深知心理学之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尽管后来因为工作变化逐步转向教育学研究和新教育实验的理论研究，但他一直关注心理学科的最新进展。想必他在笔谈之后，便即刻启动了这项工作。2022年四五月间，朱老师的学生何源博士给我打来电话，说书稿已经完成。年底，由朱老师和何源博士共同主编的《教师要懂的心理学》如期出版。

先哲苏格拉底在‘受审’的法庭上说：‘我向来都有精灵之声，无论对任何小事，只要是不该做的，它都会出而谏阻。’对苏格拉底来说，幸福即‘得到一个好的精灵’。这个‘精灵’，不会给他知识，也不会给他行动指南，而是‘谏阻’，是提示他什么事‘不准做’。

我想，这一册《教师要懂的心理学》，亦为‘幸福学’之书。它既介绍了教师要懂的诸多心理学常识，同时也给人警醒：作为教师，什么事不要做，什么话要斟酌着说，所有的课程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天理、地理、人理去设计与实施……就是在这样一些具体的教育教学场景中，教师的职业获得感和人生幸福感就像渡船靠上了码头，锚定，扎根，四季有福。

何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没有‘在这一行动本身中去创造幸福’，就没有‘幸福完整’。同时，幸福作为心理学的关键命题，也必须直面死亡、疾病、痛苦、侮辱、失意、悔恨以及各种‘坏情绪’。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教师要懂的心理学》一书，视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心理学描述，视为新教育实验的心理学指南，视为教师自我建设的心理学参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